

“文化大革命” 史稿

金春明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金春明 著

文化大革命
史稿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95 · 成都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汪 润
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
技术设计：何 华

“文化大革命”史稿

金春明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 3 号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：6660527 6666009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日报印刷厂新硕分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6.75 插页 4 字数 360 千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0-02868-7/K·413 印数：1—12000 册

定价：19.00 元（软精装）

25.00 元（硬精装）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前 言..... | (1) |
| 第一篇 山雨欲来 | (1) |
| 第一章 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..... | (5) |
| 五亿农民实现合作化..... | (5) |
| 资产阶级私有制基本消灭..... | (9) |
| 中共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..... | (13) |
| 反右后对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..... | (17) |
| 第二章 高速发展愿望的挫折..... | (24) |
| “大跃进”的愿望与实践 | (25) |
| 对“大跃进”的几点认识..... | (35) |
| 人民公社一轰而起..... | (40) |
| 急于过渡思想有所纠正并未解决..... | (44) |
| 第三章 对教训认识的分歧..... | (51) |
| 毛泽东领导的纠“左” | (51) |
| 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..... | (5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由纠“左”转而反右的原因 | (62) |
| 认识分歧的继续发展 | (67) |
| 第四章 “重提阶级斗争”和“左”倾思潮的发展 | (75) |
| “重提阶级斗争”的背景 | (76) |
|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 | (82) |
|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| (87) |
|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错误批判 | (92) |
| 第五章 中苏两党论争对矛盾的催化 | (96) |
| 中苏两党矛盾的历史回顾 | (96) |
| 中苏两党的主要分歧 | (106) |
| 内外矛盾的恶性循环 | (113) |
| 第六章 错误的形势估量导致错误的决策 | (120) |
| 在恶性循环中错误急骤升级 | (121) |
| 个人崇拜的加剧 | (130) |
| 点燃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导火索 | (137) |
| 第二篇 狂风折梁 | (145) |
| 第七章 史无前例的大风暴突然袭来 | (146) |
| 改变趋向的五月政治局会议 | (147) |
| 所谓“彭、罗、陆、杨”问题 | (151) |
| 林彪的“五一八”讲话 | (159) |
| “文化大革命”纲领《五一六通知》的通过 | (163) |
|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| (168) |
| 第八章 “炮打司令部”，全国大动乱 | (171) |
| 异乎寻常的措施 | (171) |
| 五十多天里的曲折 | (17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| (178) |
| 接见红卫兵，全国大串连 | (181) |
| 批判所谓“资反路线” | (186) |
| 第九章 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 | (190) |
| “华亭事件”：上海大动乱的发端 | (192) |
| “康平路事件”：一派掌权的关键 | (195) |
| 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》与《紧急通告》的幕后种种 | (198) |
| “打倒上海市委大会”，开始全面夺权 | (203) |
| “一二八”炮打张春桥和红革会被镇压 | (205) |
|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| (207) |
| 上海“一月革命”对全国的影响 | (211) |
| “一月革命”性质的分析 | (215) |
| 第十章 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 | (220) |
| 二月抗争的起因 | (221) |
| 多次激烈的抗争 | (230) |
| 被打成“逆流”，遭到错误批判 | (234) |
| 二月抗争的意义 | (239) |
| 两个事实的商榷 | (242) |
| 第十一章 刘少奇大冤案的铸成 | (246) |
|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| (247) |
| 对刘少奇的荒谬批判 | (255) |
| 江青、康生一伙的栽赃陷害 | (265) |
| 历史公正，冤案彻底昭雪 | (271) |
| 第三篇 欲罢难休 | (275) |
| 第十二章 “文化大革命”高峰的中共九大 | (27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九大的准备过程 | (276) |
| 九大的议程和会议经过 | (281) |
| 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 | (288) |
| 九大的特点和评价 | (302) |
| 第十三章 维护“文化大革命”既成格局的努力 | (306) |
| 毛泽东的三年设想 | (306) |
| 党组织活动的恢复 | (308) |
| 所谓“斗、批、改” | (315) |
| 不成功的教育改革 | (319) |
| 对所谓“五一六”的清查 | (323) |
| 经济建设又被提到重要议程 | (326) |
| 第十四章 惊心动魄的“九一三”事件 | (328) |
| 林彪急于抢班夺权 | (329) |
|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阴谋 | (331) |
| 狗急跳墙，策划武装政变 | (335) |
| 阴谋败露，仓惶出逃，自取灭亡 | (338) |
| “九一三”事件的深刻教训 | (344) |
| 第十五章 纠“左”与批右之争 | (347) |
| “九一三”事件后各方面的转机 | (347) |
| “批林整风”的曲折 | (352) |
| 中共十大的召开 | (355) |
| 第四篇 风波又起 | (359) |
| 第十六章 逆风突起的批林批孔运动 | (360) |
| 为什么要“批林批孔” | (360) |
|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 | (364) |

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|
| 转向评法批儒..... | (367) |
| 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..... | (368) |
| “四人帮”组阁阴谋的失败 | (374) |
| 第十七章 一九七五年的整顿..... | (378) |
| 邓小平被起用的特殊条件..... | (379) |
| 雷厉风行的整顿..... | (382) |
| 整顿中的两场风波..... | (386) |
| 全面整顿成效显著..... | (391) |
| 第十八章 突然“批邓”使形势逆转..... | (395) |
| 突然刮起的“批邓”风..... | (395) |
| 为什么要发动“批邓” | (398) |
| “批邓”的过程 | (401) |
| 第十九章 天安门广场的特殊战斗..... | (406) |
| 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..... | (406) |
|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..... | (409) |
| 天安门广场在怒吼..... | (413) |
| 错误的镇压..... | (417) |
| 造成误断的原因..... | (420) |
| 天安门事件的性质..... | (425) |
| 天安门事件的深远影响..... | (429) |
| 第二十章 “四人帮”的覆灭和“文化大革命” 的结束..... | (433) |
| “四人帮”集团的形成和特点 | (433) |
| “四人帮”野心急剧膨胀 | (441) |
| 毛泽东病逝，江青等加紧篡权..... | (444) |
| 十月粉碎“四人帮”的胜利..... | (44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上海余党暴乱阴谋的破灭 | (453) |
| 戏剧性巨大变化的一年 | (455) |
| 几点主要教训 | (456) |
| 第五篇 余波渐平 | (463) |
| 第二十一章 “两个凡是”继续肯定“文化大革命” | (465) |
| 新时期的旧错误 | (465) |
| 中共十一大得失 | (471) |
| 两年中的有益工作和新失误 | (475) |
| 第二十二章 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全面拨乱反正 | (480) |
| 思想禁锢的突破 | (480) |
| 扭转局势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| (485) |
| 拨正航向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| (489) |
| 拨乱反正势如破竹 | (494) |
| 为刘少奇正式平反 | (497) |
| 第二十三章 《历史决议》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彻底否定 | (501) |
| 彻底拨乱反正的关键 | (501) |
| 对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| (504) |
| 组织上的及时调整 | (508) |
| 《历史决议》的通过 | (510) |
| 群众性的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 | (517) |
| 后记 | (521) |

第一篇 山雨欲来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1966年夏全面爆发的，尽管这一运动的发生看似十分突然，但只要仔细思索，认真探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同其他任何历史事件一样，决非无因之果，人们可以从以前的历史过程中发现其许多蛛丝马迹和深刻渊源。但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？由于分析问题的观点不同，角度的差异，掌握历史资料多寡、全面准确程度的不同，以及种种其他原因，一直有种种不同的分析和议论。正像一位有“中国问题权威”之名的美国教授所说的那样：“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

人众说纷纭。”^① 尽管说法不一，观点纷陈，但是，概括起来不过三大类：

一类意见认为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，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。其最典型的代表，就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发表的毛泽东语录，如认为“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建设社会主义，是完全必要的，是非常及时的。”还有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件。如林彪《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》中说：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决不是偶然发生的。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。”^② 经过十年实践检验和随后的拨乱反正，这种观点已经被否定。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生，并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。它是在中国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，并不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都必须进行的。它也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继续进行革命的主要内容，更不是不搞这种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巩固，就要蜕化变质。从宏观的角度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。

另一类意见认为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个没有社会历史根源的偶发事件，它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

^① 斯图尔特·R·斯拉姆：《大变动的局限性：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地位》，《中国季刊》，1986年12月。

^② 两个阶级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，两条道路指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，两条路线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。这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一种“左”的错误理论。

泽东一个人的过失造成的。没有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，就不会有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里又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认为，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，但这种理想是小生产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。他为了追求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，而给中国造成了灾难。另一种说法则认为，毛泽东是一位封建暴君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权力之爭的结果。如香港某刊物说：“文革是一场党内斗争，是毛泽东的夺权斗争，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暴乱。”^① 又如香港另一期刊的一篇文章，其题目就叫做《文化大革命——毛泽东帝王思想的产物》。^② 这些看法从认识论上说均属于唯心主义范畴，其共同的缺欠是过分地突出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。从表面上看，立论颇为激烈刺激，但它却并没有跳出一切功劳归于一个人，或反过来说，一切过失也归于一个人的个人迷信的范畴。这种说法同中国的实际情况显然不相符合。

第三类意见认为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生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，但也不是一个领导者的个人过失造成的。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由于党对国内政治状况及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，制定了错误方针路线而产生的“左”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，是严重的“左”倾错误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产物。它是当时中国社会蕴聚的各种矛盾，包括党内矛盾、国内矛盾和国外矛盾的一次总爆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毛泽东毫无疑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但过失绝不只是他一个

① 《争鸣》1982年62期。

② 《中国之春》1985年3月，总第21期。

人的。因此，当我们回过头来，认真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，特别是 1956 年以后的历史发展时，是可以找寻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的种种客观历史因素的。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其发生的前十年国内外蕴聚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。这是目前中国大陆上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观点，作者本人也持这种观点。这种观点是否真有道理、是否符合客观历史事实？让我们从下边的历史考察中来证明吧。

第一章 对社会主要矛盾 认识的改变

1956年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。

五亿农民实现合作化

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运动，从1953年正式开展后，进程不断加快。1953年6月，党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。^① 1954年6月，中共中央鉴于我国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才一年，即已显露出某些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紧张情况，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，要求各方面加紧努力发展农业生产。中共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八人小组经过反复研究，由组长陈云向党中央作了汇报。他指出：“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：开荒，修水利、合作化。这些办法都要采用，但见效最快的，在目前，还是合作化。”“搞合作化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

^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，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，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，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、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

百分之十五到三十。”^①这样，就决定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度。10月召开的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提出，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的初级合作化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先后转入高级合作化。会议认为，互助合作运动必须贯彻互利的原则，对私有的土地和耕牛仍给一定的报酬，转化为公有时要采取曲折缓进的办法。

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势下，中共各级组织加强领导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合作化运动来势很猛，发展迅速。到1954年底，全国已建立初级社48万个，其中30多万个是秋后建立的。但是，由于有些地方工作粗糙，农民对合作化缺乏思想准备、部分农民怕财产归公，因而出现大量出卖耕畜、杀羊、砍树等现象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中共中央在1955年1月及时发出《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》，要求凡是基本上完成原定计划的地区，应停止发展，着重巩固；原订计划过高的地区，可适当收缩；离完成原计划尚远的地区，应在巩固中继续发展。这样就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。

1955年4月，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。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致开幕词。他肯定1954年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主要的，同时认为存在三个问题：（1）原定的发展60万个社的计划大了一点，原因是对主观力量估计过高，对群众觉悟估计过高，把办社看得太容易了。（2）许多地方在工作中违反自愿互利原则。在土地评产，土地劳力分红比例，耕畜树木入社等问题上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。（3）有些工作没有走群众路线。这

^① 《陈云文稿选编》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24、225页。

些问题都是“左”的错误。他认为，今后总的方针，应是停止发展，全力巩固。发展过大的要适当收缩。秋后如何发展，看情况再定。在这个精神指导下，个别地方发生了“坚决收缩”，砍掉一批合作社的现象。（例如浙江省在这个精神指导下，解散了近两万个不具备必要条件的农业合作社。但是，像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指责刘少奇“砍掉 20 万个农业合作社”的错误，则是以讹传讹，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。）这样的一些估计和做法，毛泽东是不同意的。于是就在党内引发了围绕着下列两个问题的一场大争论：（1）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偏差，主要是“左”还是右；（2）合作化应该保持何等速度，是小发展还是大发展。

7月31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报告。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、步骤和深远意义，规定了“全面规划，加强领导”的方针，重申了自愿互利，逐步前进的原则，强调要注意合作社的质量等，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。但是，报告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，主要不是“左”的偏差，而是右倾机会主义。他说，有些同志像“小脚女人”，对合作化运动过多的评头品足，不适当的埋怨，无穷的忧虑，数不清的清规戒律，在不到运动的主流，犯了右的错误。接着，在10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对合作社实行所谓“坚决收缩”的方针。他认为，提出上述方针的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，看不见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，看不见大多数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，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。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作结论时说，这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大辩论，是“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”。他说：

“群众要求大发展，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，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。”他认为，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是犯了“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”。这样，就把党内同志之间关于实际工作的正常意见分歧和争论，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，并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，这很显然是不恰当的。从上述言论中，已经可以看出毛泽东脱离中国实际的急于求成的思想，和对党内意见分歧估计过于严重的“左”的认识。不过当时还是属于局部的个别方面。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，邓子恢等人的看法并不是错误的。

不切实际地强调反右倾，错误地批判所谓“小脚女人”，助长了本来已经存在的贪多求快、急于抢先的“左”倾思想的发展，这就导致大大地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。毛泽东在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报告中，设想用五年时间完成农业初级合作化，1960年以后再开展高级合作化，而实际工作进程，又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的设想。到1955年底，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59.3%，加上参加高级社的4%，已超过60%。而到1956年底，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.8%，基本上实现高级化了。原定15年的任务，只用4年就完成了。

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，主要形式也是合作化。中国共有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1900多万人。原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合作化。后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，手工业的合作化到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。建立10万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、组，参加人数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1.7%。

五亿农民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，